

文天祥传奇

2.4

海上魂

湖南人民出版社

海上魂

陈思涛 著

孙莘田 孙 逊 校注

责任编辑：李恕基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5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28,000 印张，6.75 印数，1——115,000

统一书号，16109·1842 定价，0.80元

前 言

我馆于一九五九年入藏的两部章回体历史小说《海上魂》和《海外扶余》，撰于清末民国初年。两书分别借文天祥抗元和郑成功抗清的史实为题材，形象地宣传了爱国重于爱身爱家的思想。这在当时，是唤醒民众抵御外侮的优秀作品；即在今天，也是一份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有用教材。两书均四卷十六回，小32开本，线装各二册，未署撰者姓名，亦无落款日期和图章别识可供查考。过去均未刊印过，《贩书偶记》、《晚清文学丛抄》以及《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等亦未注录，历来知者甚少。作品在思想内容方面有一定进步意义；在艺术形式方面也有一定特色。现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将此两书分别出版，前此我馆曾约请孙菊园、孙逊两位同志进行了点校，在此顺致谢忱。

上海师范学院图书馆

一九八四年二月

导 论

人们常说，爱情是文艺创作永恒的题材。其实，作为广义的爱情，还有着远比一般男女之情更深的内涵，这就是：对祖国和民族的爱。这是一种伟大而永恒的爱，千百年来，它孕育了一代又一代文人骚客，在文学的园地上树起了一面面光辉灿烂的爱国主义旗帜。特别是当我国进入近代社会以后，日益加剧的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给传统的爱国思想又注入了反对帝国主义、强盛国家民族的新内容。这里我们介绍给广大读者的，便是这样两部近代宣传爱国主义的历史小说。

众所周知，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我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清室屡挫于外敌，政治腐败，国几不国。一九一一年，这个腐朽不堪的老大帝国终于为革命所推翻。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换来的却是连年军阀混战，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有增无减，列强瓜分中国的危险依然如燃眉之急。在这种形势下，一些有识之士的亡国之忧日益深切，于是他们纷纷通过创作小说这一通俗的文学形式，或直接抨击时事，或间接叙述历史，极力鼓动种族革命，宣传爱国思想，以唤醒沉睡的民众。在这时期的讲史类小说中，就产生了象吴趼人的《痛史》、痛哭生第二的《仇史》等宣传爱国主义的历史小说。前者写宋末文天祥抗元事，后者演明末清初一段历史，惜都未完稿。

无独有偶，清末民初另有两部主旨题材均与《痛史》、《仇史》相类的小说，一曰《海上魂》，写文天祥抗元；一曰《海外扶余》，写郑成功抗清。这两部小说由于未正式出版，知者无几，历来小说史料都未提及。论者每以为近代小说成就不高，其实成就高低都是相对而言，在宣传爱国反帝和种族革命这一点上，近代小说以及整个近代文学自有其前人不可企及之处。

《海上魂》和《海外扶余》各为四卷十六回，不署作者姓名。笔者所见均为抄本，两书所用纸张质地、开面大小、抄写款式及笔迹都基本相同。书前各有序言一篇，无落款年月，亦无图章别识。关于两书的作者，藏抄卡片中写明《海上魂》作者为陈墨涛，《海外扶余》作者为陈墨峰；但今翻查全书，均未从中找到根据，查其它资料也未找见。据当事人云，卡片中的署名肯定有根据，他记忆中好像是书中夹着的附页写明的。但今附页已不存，抑或年久遗失之故？根据文笔语气来看，此二书可能为一人所作，墨涛、墨峰系作者的两个化名；也可能分别为兄弟俩所作，墨涛、墨峰正是兄弟排行的名字。在未找到更确凿的材料之前，我们只能暂且按照卡片中抄写的署名录而存疑。

关于两书的成书年代，因《海上魂》序言中有“行将看太平洋上，于二十世纪开绝大之舞台，演非常之绝剧，而奈之何我同胞犹有昏昏梦梦、如醉如睡者”等语，故可知为一九〇〇年以后的作品。又《海外扶余》第十六回有借托于谦之口所说的四句偈言，其中二句云：“莫道太行山不动，看将三百去

三三。”这是暗寓清王朝命运的两句谜语式偈言。按照小说本身的解释，前一句的“太行山一定指清人无疑”，后一句则是讲清朝最后结果时，“须要三百去了九年的年数，减去了三十三年的年数”。按，清王朝从一六四四年顺治即位，入主中原算起，至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宣统逊位恰好是二百六十七年，正应了“三百去三三”（按三百年去掉三十三年算）这句偈语。一个生活在清王朝时代的人，如果没有亲眼看到它的覆灭，是不可能预卜它具体会存在多少年的。故可证这两部小说的最后成书时间已在清王朝被推翻以后，因而它才能把这个王朝的寿命算计得如此准确无误。要而言之，这两部小说的创作可能开始于清末，但它们的最后完成肯定已在民初。只是此时离清朝统治成为“明日黄花”之后还不会太久，因而小说对异族统治的那种愤激之情还溢于言表。

关于这两部小说的思想艺术特色，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两部作品都具有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置“国”于“身”、“家”、“君”、“父”之上，把国家利益看作高于一切，重于一切。这是作者创作的出发点，也是作品贯穿始终的一个重要思想，它在当时尤其是难能可贵的。打开《海外扶余》，其序中就有这样一段议论：

“夫国既不保，何问于家？种且不保，何问于身？此必然之势也。然而今试执途人两告之曰：若身有疾，不治将丧；若家有疾，不治将亡；未有不色然怒者也。及其信也，必百计以挽回之。更告之曰：若国有疾，不治将丧；若种有疾，

不治将亡，亦必笑而置之而已。即其信也，亦但相对嗟叹而已，岂固有所以救之者？噫，是诚爱身爱家之重于爱国矣！虽然，是虽爱身家而实又不善爱者也！夫种者积身而成也，国者积家而成也。善谋家者不遗其国，而后家可谋焉；善保身者不遗其种，而后身可保焉……吾身既在，则吾亦国家之一小分子也；既有一分子在，安可弃其责任？！”

这段话立论纯正，说理透彻，颇能切中当时一般国民的心理。其中所阐述的爱国重于爱身爱家的思想，即使在今天也还有着积极的意义。

又《海上魂》开卷也有一段议论云：

“大凡我们中国的伦理，只有子死于父、臣死于君的义务，并没有民死于国的格言，所以弄得为民的视国之存亡毫不动心。无论奸臣篡位，异种窃居，他也俯首帖耳，做个顺天之义民，随你朝秦暮楚，今日就一王，明日立一君，我为民的总不失我为民的面目……虽然黄帝有灵，终不使我们中国好男儿被他磨灭尽了，所以卖国求荣的只管卖国求荣，那舍死报国的却仍旧是舍死报国。”

此外《海上魂》第十六回也有一段作者的议论云：

“咳，看官，你看偌大一个中国，人民不下数亿兆，当下只听得‘皇帝死了’四个字，便纷纷争迎异族，高挂降旗，那旗上还写着‘大某顺民’四个大字。象这样的举动，在他的心思，不过是说皇帝已死，事无可为，所以投降。岂知你若果有志气，何必一定要有皇帝才可以有为？皇帝虽死，你但尽你的力，做你的事，替中国争体面，难道人敢笑你无知妄

为吗？这是断没有这个道理的。况且你若人人存了此心，皇帝虽死，中国不死，总要与异种决个我存你亡，那时无论如何凶悍的蛮族，虎狼的异种，我只怕也要闻风遁逃，望影奔逃哩！”

上述两段文字则是明显地将国家置于君、父之上，提出了诸如“民死于国”、“皇帝虽死，中国不死”等具有近代色彩的新格言，与传统的“子死于父，臣死于君”的伦理相抗衡，以唤醒“视国之存亡毫不动心”的国民。

诸如此类的议论，在两部小说内比比皆是。毫无疑问，这些议论在近代进步小说里是非常典型的，它说明作者乃有意识的用小说作为武器，宣传反帝反清和爱国思想。特别是在当时，正是“强权之旗到处奔走，民族帝国之风潮排山倒海而来”的二十世纪开始，而“我同胞犹有昏昏梦梦、如醉如睡者”，因而这些议论读来更有一种振聋发聩的感觉。

当然，无庸讳言，这两部小说所宣传的爱国思想，包含了狭隘的民族观点。这突出地表现在它把同属于中华民族之一的蒙古族、满族等少数民族，统统斥之为“蛮族”、“异种”，把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也作为一种“亡国”的表现。这种狭隘的民族感情是历史上许多爱国者所共同具有的历史局限，我们今天既不应苛求古人，同时也必须实事求是地予以指出和批评。不过这两部小说的作者作为生活在近代社会的人，其爱国主义内涵已超越了古人的范畴，而注入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海外扶余》第一回作者讲到：“咳，这亡国的苦楚，须是不好吃的呢！不用讲将来瓜分的苦楚，就是从

前朝代改革的苦楚，也尽够吃了。不用讲远，就只看明末清初的兵革，扬州十日，杀得八十几万；嘉定一县城，也杀得四、五万；此外无记载可考的，全天下算起来，就不知几千万万。你道亡国是容易的吗？”这里，既把从前朝代鼎革也当作了“亡国”——这反映了作者狭隘的民族感情一面，但他讲历史上兵革的苦楚，正是为唤醒人们知道“将来瓜分的苦楚”，以奋起救将亡之中国。他在此虽把“朝代改革”和“亡国”等同视之，但把“瓜分”和“朝代改革”却又是分开说的，而且其语气“将来瓜分的苦楚”又远在“从前朝代改革的苦楚”之上。这说明小说作者此时所担心的，主要是列强瓜分中国的危险，尽管他思想上也免不了有狭隘的民族感情。

其次，《海上魂》和《海外扶余》作为两部历史小说，在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时，基本上遵循了我国传统讲史小说“七分真、三分假”的原则，表现了可贵的忠于客观史实的精神。

论者每以“七分真、三分假”评论《三国演义》，其实《三国演义》艺术虚构和夸张的成分远要多一些。在这方面，《海上魂》和《海外扶余》似比它更要忠实于历史。不仅两部小说所写及的主要人物，大都可以从史书中找到记载；而且它们所描写的主要事件，也都程度不同地有着历史依据。《海上魂》中文天祥自请以二王（赵昰、赵昺）镇闽，广不从开始，至文天祥被俘后不屈身死为止，其中包括了二王及太后的事迹、张世杰和陆秀夫等文臣武将的表现、以及元将张弘范等人的活

动，都于史有证。《海外扶余》中郑成功的一生及其父亲郑芝龙、父执郑芝虎、郑鸿逵、郑芝豹等人的事迹，也都与史相符。如《海上魂》第十六回写张弘范劝降文天祥一节，基本上出自《宋史》文天祥传。《宋史·列传第一百七十七》：

“天祥至潮阳，见弘范，左右命之拜，不拜。弘范遂以客礼见之，与俱入厓山，使为书招张世杰。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书所《过零丁洋》诗与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范笑而置之。厓山破，军中置酒大会。弘范曰：‘国亡，丞相忠孝尽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将不失为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范义之，遣使护送天祥至京师。”

只要细心对照一下小说有关描写，其基本情节、人物关系、人物心理和人物对话全是以上述记载为蓝本，只是稍作渲染而已。

又如《海外扶余》第十四、十五回写郑成功取台湾一节，基本上也都是依据史书而来的。《明通鉴·附编卷三》载：

“成功自江宁败归，有说之取台湾者曰：‘台湾城坚，其门户为澎湖。澎湖地势低下，海船至此必易舟入，故陆而易守。且城中红夷不过千余人，余皆郑氏所迁居民也。’成功乃定计取之以为老巢。”

小说第十四回下半段写郑成功途中遇蔡宝文，蔡劝其进兵台湾一节，便由此演化而来。

又《清史稿·列传十一》载：

“……荷兰筑城二：曰赤崁、曰王城，其海口曰鹿耳门。荷兰人恃鹿耳门水浅不可渡，不为备。成功师至，水驟长丈余，舟大小衔尾径进，红毛人弃赤崁走保王城。成功使谓之曰：‘土地我故有，当还我；珍宝恣尔载归。’国七阅月，红毛存者仅百数十，城下，皆遁归国。成功乃号台湾为东都，示将建王待焉。以陈永华为谋主，制法律，定职官，兴学校。”

《明通鉴·附编卷三》载：

“成功至，突遇水涨，径以海船直薄城下，城坚不受炮。台民复献计曰：‘城外高山有水贯城濠而过，城中无井泉，所饮惟此。若塞其水源，城不攻而自溃矣。’从之，红夷遂遁。”

小说第十五回整回情节，便是根据上述记载敷演而成。

总之，两部小说所写及的主要人物和事件，我们都从史书中找到相应的依据，哪怕是一些细节和人物话语，也每每有所本。如《海上魂》第十五回写皇太妃听了陆秀夫负主投海的消息以后，失声痛哭的一段话：“奴所以数年忍死飘流至此者，正为赵氏一块肉尚在耳，今无望矣！”出自《宋史·本纪第四十七》杨太后闻弑死抚膺大恸的一段话：“我忍死艰关至此者，正为赵氏一块肉尔，今无望矣！”《海外扶余》第十五回写郑成功劝降荷兰人的一段话：“只要还我土地，汝所有贸易资本金似等一概不要，让汝带去”，出自上引《清史稿·列传十一》成功派人对荷兰人讲的一段话：“土地我故有，当还我；珍宝恣尔载归。”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当然，我们仅仅是说小说的主要人物和情节大都有所本，

并不是说这些人物和情节都完全按照史书照录不误。作为文艺作品的小说，其间自然有大量想象、夸张、虚构和加工的成分。往往在史书中只是简略的几句记载，到小说里便演化成颇有声有色的大段描写；虽然那几句记载是大段描写的骨架，但大量的血肉是小说后加的。只是与我国讲史小说中那些假借的成分太多的小说相比，这两部小说虽多有点染，却非乌有子虚之比。至于其间朝政得失，人物聚散，更是确考时地。这种忠实于客观历史的精神，在我国历史小说中是比较突出的。

再次，这两部小说在艺术上也有一定的特色。在结构上，它们完全继承了我国古代说话体和章回体的传统，纯粹是采用旧小说形式；在艺术描写上，则吸收了不少传统的手法，并不乏可观之处。

《海上魂》和《海外扶余》都是属于章回体，每回回目都是对仗的上下两联，这两联基本上概括了一回的主要内容；而且每回回前都有诗词作引子，回后则有诗对作结，然后连缀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之类的套语。同时，作者又完全采用了“说书人”的口吻，保留了许多口头文学的特点。书中常常见“咳，看官”等称呼语气，作者并直以“说书的”自谓，诸如“不枉说书的一番饶饶不休、唇焦舌敝”之类。在情节安排上，则是按时间顺序一一叙来，交代过一边，再说另一边，所谓“话分两头，各表一支”，讲究故事的脉络清楚，有头有尾。总之，在形式上似有意模仿古代话本的体制，颇似“拟话本”，在它们身上还看不到直接或间接

受西洋小说影响的痕迹。

近代小说一般议论过多，形象较少，笔无藏锋，缺少含蓄，《海上魂》和《海外扶余》也有同样的缺陷。但是，它们也成功地吸收和借鉴了一些传统的手法，在描写上不无可观之处。如《海外扶余》第八回写郑成功部下先锋陈志超与敌将对阵厮打一场：

“先锋陈志超出营讨伐，只见城上旌旗密密，戈甲层层，早已备得整齐。城门开处，一员步将身高八尺，遍身和黑炭也似的，手拿一把开山大斧，大踏步走到阵前。陈志超喝道：‘未将通名，免得做无名小将，污了我功劳簿子。’那将也不答话，把斧迎头便劈。陈志超晓得是个力莽，忙把枪架开时，只觉非常沉重，心里大惊；战了约十余合，已累得浑身臭汗，勉强支持到二十合左右，实在支持不住，只得喝道：‘今天且饶你一死，明日来取你首级吧！’说完，拨转马头逃回阵里。”

又如《海外扶余》第九回写郑成功杀吴希孔一节：

“吴希孔见势危急，便跳过成功船上，见一个英姿秀慨、朱蓝银标的大将立在舱中，晓得是成功，握着刀，直奔了过来。成功大怒道：‘狗头，也敢来惹本帅！’便立着不动。待吴希孔一刀砍来，成功单手握枪一抵，那刀已倒震了起来，顺势一枪掬去。吴希孔要躲避不及，要抵抵不开，只说得声‘利害’，那枪已直穿咽喉而死。”

这类描写虽是袭用传统的描写阵战的格局，但写得颇有声有色，表现了口头文学生动通俗的特点。类似描写在两部

小说中占有相当比重，它构成了小说主要的艺术风格。

还有些地方则描写细腻，委婉动人，表现了另一种雅致的特点。如《海上魂》第十六回写文天祥被俘后在敌船上与张弘范饮酒一节：

“文天祥此时哪里还有心吃酒，坐在那里，低头不语，却自己想自己的心事……正想到山穷水尽之际，猛听得两旁笙歌嘹亮，鼓吹声高，那隔船上将士欢呼歌唱，击箸论功。文天祥听了，不觉凄然泪下。张弘范见了，晓得他是触景伤情，便劝道：‘丞相不必悲伤，如今国亡君死，丞相忠孝已尽。丞相若能以事宋之心改事今上皇帝，将不失仍为宰相之职。即不然，丞相耻事二君，小将愿奏明圣上，奉丞相于名山胜水之乡，不问世事，隐居以乐天年，做个故宋遗民，丞相也算不屈节了。难道一定要以死殉国，才算得忠臣吗？’这一路话说得婉转多情。文天祥听了这篇话，那想逃走图再举的念头虽然不为所动，却也感谢他这一片热心，替自己筹谋后计，便凄然答道：‘深感将军厚爱，但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亡国之臣，亦安敢不念亡国之伤，安然自乐天年呢？今日别无他望，惟求将军速赐一死，便感将军厚恩了。’说罢，长叹一声，便低下头去。”

这里写了两个不同性质的人物，既有对话描写，又有心理描写，写得都很合情合理，细腻地写出了两个人物的复杂心理和感情，向我们展示了两个活生生的人。虽然这类笔触在两部小说中所占比重不是很多，但它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小说作者的艺术表现力。

综上所述,《海上魂》和《海外扶余》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艺术形式上,都还有不少可取之处,把它们置于近代小说中来考察,可算是中乘的作品。我们今天与其大量刊印晚清侠义小说之类,不如将这些与我国近代爱国主义思潮息息相通的小说有选择地介绍一些。正是抱着这样的目的,我们整理点校了这两部小说。

关于两书的校勘注释,由于原书是孤本,从未刊印过,故不存在依据别的版本它校的问题,而只是就原书进行了适当的点校整理。归纳起来,我们大致做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由于形近音近等原因而造成的笔误,多数是一些错字讹字,我们尽量作了改正。如《海外扶余》第五回用了“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耳”一语,查此语出自《论语·子张》,但原文抄作了“大德不输闲”,“输”明显为“逾”之误。又如同书第六回有一首写大战场面的骈文,其中有二句原为:“神火之将军鼓勇,箭出时,万众灰尘;佛兰之都督施威,弹到处,千人血肉。”按,“佛兰”在此无论如何解释不通,根据上下文意思,此应为“佛郎”之误,“佛郎”即佛郎机,明代称葡萄牙人制造的炮为佛郎机,此一名称在小说中曾多次出现,故我们就这样臆改了。类似的情形很多,如“下令”误作“下领”、“寻出路”误作“尽出路”、“气忿忿”误作“气氛氛”、“众士卒”误作“总士卒”、“撬开”误作“拔开”、“帮他指点传令”误作“撮他指点传令”……诸如此类,恕不一一列举了。二是由于小说写成后未经仔细修改推敲,故未免有疏漏之处,对此我们作了尽可能合理的臆改。如《海外扶余》第

六回有一句话原为：“向那边一看，只见数只敌船正围住一只蓝带黄边旗在那里苦战”，句子明显不通，因为“数只敌船”不能围了“旗”在那里苦战，同时“一只……旗”搭配也不当，故我们只能改成：“只见数只敌船正围住一只蓝带黄边旗的船在那里苦战”。又如同书第七回副写了“命李彰、陈壁恭、黄克功、邓飞鹏四人各领一千兵马”去劫敌寨，紧接后又写“叫饶将万春、邓飞鹏、龚曰飞、罗孝德四人也都分头埋伏去”，邓飞鹏一人同时被任命分身去两个地方，显然也是疏漏之处，我们只能把其中一个“邓飞鹏”臆改作“刘戎万”，这类情形要比更少一些。另外，个别地方虽明显乖于情理，但因系游戏之笔，故我们未作删改。如《海外扶余》第三回写黄熙允来劝降郑芝龙，说起“你明天把《国朝名臣言行录》、《皇清尚友录》、《国朝先正事略》各书翻开来看时，难道都是满人？我看恐怕汉人还比满人多呢！”黄熙允说这话时尚是明末，如何能从他嘴里讲出清代才出现的书名？显然违背了常理。但联系上下文看得出是作者故意的一种戏谑之笔，故我们一仍其旧。至于注释，我们的原则是条目尽量少选，注文则尽量简略。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本书的点、校、注各方面一定会存在不少问题，我们恳切地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本书在整理过程中，得到了我们学院有关领导、图书馆有关领导和同志的真诚支持和帮助，他们的热忱是我们永远难以忘怀的。同时，湖南人民出版社从此项工作一开始就不断予以关心督促，帮我们解决工作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值此

一并表示谢忱。

孙 逊 孙菊园

一九八四年二月